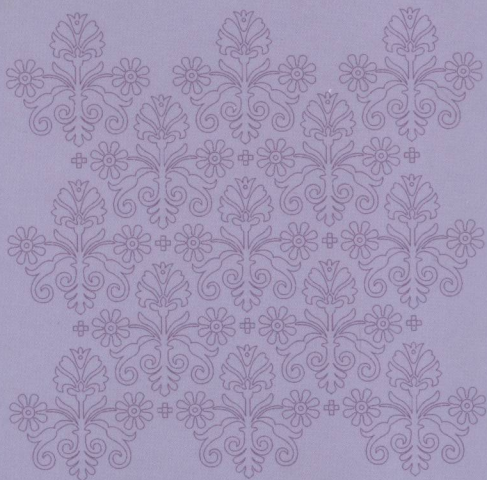


上海市高校教育高地建设项目

西方修辞学简史

A Brief History of Western Rhetoric

姚喜明 等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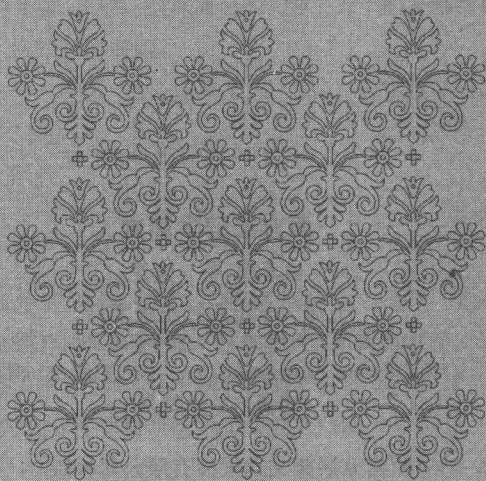


上海大学出版社

西方修辞学简史

A Brief History of Western Rhetoric

姚喜明 等 编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修辞学简史/姚喜明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81118-510-2

I. 西… II. 姚… III. 修辞学-语言史-西方国家
IV. H05.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9383 号

责任编辑 张芝佳

封面设计 柯国富

技术编辑 金鑫

章斐

西方修辞学简史

姚喜明等 编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 姚铁军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25 字数 257 000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ISBN 978-7-81118-510-2/H·197 定价: 21.00 元



前言

FOREWORD

从2000年投身到著名学者胡曙中教授门下,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西方修辞学起,几乎快要10年了。不断地学习,却发现修辞学越来越繁杂,头绪越来越多,似乎无边无际,其间曾产生过想要编写一本西方修辞学简史的念头,但因资料匮乏,也感觉时间和精力有限,便一直没有动笔。2008年1月到5月,在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资助下,曾有幸到美国匹兹堡大学传播系进行短期的访问研究,该校丰富的专业藏书、知名的修辞学教授、良好的学术氛围等都令人印象深刻。在和John Lyne、John Poulakos等教授及该专业在读博士生的交流中,曾有一种只见树木难见森林的感觉。这种感觉促使编者决定要把早已出现的编书念头付诸行动。

回国后,在殷宁、李艳芳、周健华和王惠敏等人的协助下,把资料进行了梳理,并进行了编写分工。本书的整体结构安排、第1章绪论、全书的通稿及润色由姚喜明负责;第2章、第3章由殷宁负责;第4章、第5章由李艳芳负责;第6章的大部分由周健华负责,其中的6.2、6.4.13、6.4.14、6.4.15等由王惠敏负责;第7章由王惠敏负责。喻亮和吕宁参与了书稿的部分校对工作。

本书之所以得以完成是和来自方方面面的帮助与支持分不开的。首先,要感谢恩师胡曙中教授多年来的帮助和关怀,在编者2003年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后仍不断给予鼓励和指导,无论是在把握研究方向上还是在解决一些细小问题上,都使编者受益良多。其次,要感谢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大力支持,谢之君、冯奇、庄恩平、徐钟等教授为编者的科研、教学及生活等各方面都提供了诸多便利。再者,要感谢匹兹堡大学的 John Lyne、John Poulakos、Lester Olson、Barbara Warnick、Ronald Zboray、Brenton Malin 等教授,他们或馈赠资料,或与编者探讨问题,或提供各种生活便利,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的完成也是不可想象的。另外,本书还得到“上海市高校教育高地建设项目”以及“上海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的资助。最后,还要感谢泰国宋卡王子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兼普吉孔子学院泰方院长 Supachai Sangpunya 先生,他对中国的友好感情、对编者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以及他工作的忘我态度都不断激励着编者尽早地完成本书的编写。

本书虽然完成了,但遗憾总是难以避免的。限于编者的水平,本书肯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欢迎各位读者指正。

姚喜明

2009年6月29日于泰国普吉孔子学院



目 录

CONTENTS

第 1 章 绪论	001
1.1 人与语言	001
1.2 语言与修辞	002
1.3 修辞与伦理	005
1.4 修辞手段与暴力手段	007
1.5 修辞与政治	011
1.6 小结	016
 第 2 章 古希腊：修辞学的诞生	019
2.1 孕育修辞学的早期民主制度	019
2.2 古希腊早期修辞实践和修辞理论	023
2.2.1 古代法庭中的修辞实践	023
2.2.2 科拉克斯和蒂西雅斯的修辞理论	025
2.3 诡辩派的兴起	028
2.3.1 诡辩派修辞活动概述	028
2.3.2 诡辩派的教育活动	030
2.3.3 诡辩派产生的社会根源	034
2.3.4 诡辩派的特征	035
2.4 诡辩派的代表人物	037
2.4.1 普罗泰戈拉	037

2.4.2	高尔吉亚	040
2.4.3	安梯丰	044
2.4.4	吕西亚斯	047
2.4.5	伊索克拉底	050
2.5	诡辩派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性	055
2.6	古典修辞理论的反思与升华	059
2.6.1	柏拉图: 正派的修辞与邪恶的修辞	059
2.6.2	亚里士多德与古典修辞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修辞学》	064
2.7	小结	073
第3章	古罗马: 古典修辞学的鼎盛时期	074
3.1	“希腊化时期”的修辞学	074
3.2	狄奥弗拉斯特与赫尔玛格拉斯	077
3.3	最早的拉丁语修辞学著作——《论觅材取材》与《古罗马 修辞术》	080
3.4	古罗马最伟大的演说家、修辞学家——西塞罗	083
3.5	古罗马最成功的修辞教育家——昆提利安	088
第4章	中世纪的西方修辞学	093
4.1	欧洲的动荡与大学的兴起	093
4.1.1	社会动荡的中世纪	093
4.1.2	大学的兴起与发展	095
4.2	修辞学的式微与转向	096
4.2.1	中世纪的三种修辞传统	098
4.2.2	布道修辞	100
4.2.3	书信修辞	105
4.2.4	诗学修辞	108

4.3 中世纪主要修辞学家	109
4.3.1 奥古斯丁	109
4.3.2 马蒂纳斯·卡佩拉	113
4.3.3 波爱修斯	114
4.4 小结	118
第5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修辞学	120
5.1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	120
5.2 文艺复兴修辞学概览	122
5.2.1 修辞学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	124
5.2.2 本土修辞学的蓬勃发展	126
5.2.3 妇女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学	127
5.3 修辞学与意大利人文主义	130
5.3.1 人文主义的兴起	130
5.3.2 人文主义者与修辞学	132
5.3.3 古典修辞学的重新发现	134
5.4 文艺复兴时期的三大修辞学流派	137
5.4.1 传统派	137
5.4.2 拉米斯派	138
5.4.3 辞格手段派	139
5.5 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学家	140
5.5.1 弗兰西斯科·彼得拉克	140
5.5.2 罗伦佐·瓦拉	142
5.5.3 鲁道尔菲斯·阿格里科拉	144
5.5.4 朱安·路易斯·维夫斯	146
5.5.5 彼得·拉米斯	147
5.5.6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	150
5.5.7 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	152

5.5.8 托马斯·威尔逊	155
5.6 小结	156
第6章 启蒙时期的修辞学	158
6.1 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与修辞学	158
6.1.1 启蒙思想与沉闷的修辞	158
6.1.2 哲学家的修辞学思想	159
6.1.3 哲学思想促动下的修辞学的继承与发展	161
6.2 19世纪的修辞学	163
6.3 启蒙时期的修辞流派	166
6.3.1 新古典主义修辞学	166
6.3.2 美文学修辞学	168
6.3.3 朗诵修辞学	170
6.3.4 认知修辞学	171
6.4 启蒙时期的修辞学家	174
6.4.1 约瑟夫·艾迪生	174
6.4.2 埃德蒙·伯克	176
6.4.3 亚历山大·杰勒德	177
6.4.4 查尔斯·罗林	178
6.4.5 亚当·斯密	179
6.4.6 休·布莱尔	181
6.4.7 弗朗西斯·培根	188
6.4.8 勒内·笛卡尔	194
6.4.9 约翰·洛克	197
6.4.10 詹巴蒂斯塔·维科	199
6.4.11 大卫·休谟	202
6.4.12 乔治·坎贝尔	206
6.4.13 理查德·惠特利	209

6.4.14 亚历山大·贝恩·····	212
6.4.15 弗里德里希·尼采·····	214
第7章 20世纪西方修辞学的嬗变：从复兴到繁荣 ·····	217
7.1 西方社会的现实与修辞学的蜕变 ·····	217
7.2 文化的困境和修辞的觉醒 ·····	218
7.3 20世纪西方修辞学的发展概况 ·····	220
7.3.1 文学批评和修辞学的复兴 ·····	220
7.3.2 新修辞学运动 ·····	221
7.3.3 修辞学的批判性转向 ·····	224
7.4 20世纪西方修辞学的总体特征——跨学科性 ·····	225
7.4.1 修辞学和语言学 ·····	225
7.4.2 修辞学和哲学 ·····	226
7.4.3 修辞学和文学 ·····	229
7.5 修辞批评 ·····	230
7.5.1 修辞批评的性质、目的和步骤·····	230
7.5.2 修辞批评的范式 ·····	231
7.6 20世纪主要修辞学家 ·····	235
7.6.1 理查兹 ·····	235
7.6.2 肯尼斯·伯克 ·····	240
7.6.3 钱姆·佩雷尔曼 ·····	246
7.6.4 斯蒂芬·图尔明 ·····	251
7.6.5 理查德·韦弗 ·····	255
7.6.6 恩内斯托·格拉斯 ·····	260
7.6.7 雅克·德里达 ·····	263
7.6.8 米歇尔·福柯 ·····	265
7.6.9 尤尔根·哈贝马斯 ·····	269
参考书目 ·····	273

第1章 >>>>>

绪 论

1.1 人与语言

在人类所有的发明中,没有哪一种可以与语言相媲美。我们的发明中有哪一种比语言更重要呢?我们使用的工具中有哪一种有语言那么强大的信息传递能力和再造能力呢?语言既能传递精密的信息,同时又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为思维和想象留下无限的空间。难怪许多学者对语言赞不绝口。苏珊娜·兰格(Susanne K. Langer)说道:“语言是具有象征性的人类思想的最高、最令人惊奇的成就。它赋予人类的力量几乎是不可估量的,因为,没有语言,就不可能产生任何被称之为思想的东西。语言的诞生是人类的第一缕曙光。人与兽——最高级的猿类和最低级的野蛮人——之间的界线就是语言。”(1995: 57)哈贝马斯(Habermas)也曾说,把人从自然中擢升而起的是语言,社会上实现理性的手段嵌合在语言当中(Foss et al, 1985: 229)。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Humboldt)也曾说,“语言活动是形成思想的强大力量”(转引自伍铁平, 1994: 24)。伊索克拉底也曾写道:“正是因为我们被赋予了互相说服及清楚表达各自愿望的能力,这样我们就不但逃离了野兽的生活,而且我们还聚居起来,建立城市,制定法律,发明艺术……”(Isocrates, 1956: 327)由此可见,语言对于人类是多么地重要。

著名的新修辞学派的代表人物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给

“人”所下的定义中,突出了四个方面的特征:人是使用符号(制造符号、误用符号)的动物;是否定的发明者(或道德因否定而升华);被自己发明的工具从自然条件中分离出来;受等级精神的驱使(或因秩序意识而移动)(1966: 16)。这个定义的几个方面都和语言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因此,要认识人类自身,就必须认识人类的语言;要认识人类社会,也必须认识人类的语言。可以说,正是因为人类发明了语言,才使得人类得以改造自然世界;正是因为人类的语言,才使得人类社会得以存在、人类文明得以延续。所以说,对语言无论给予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

1.2 语言与修辞

正是由于语言才使人类从自然条件中分离出来,也正是由于语言的强大力量人类才得以借助它创造了整个人类世界,也使得人类世界得以超越自然,无限延伸。在《圣经·约翰福音》的开头,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太初有道(word),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而“道”成为“肉身”,住在人们中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里便明示了语言的隐喻,是语言为人类构筑了一个超自然的世界,向人们传递知识、思想、道德和文明。“道”成为“肉身”,便是言语和我们在一起,不可分离;我们只有借着“言语”,才能触及到抽象的“语言”。“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言”“神”合一的思想,体现了语言对信息和知识的垄断,对真理的垄断,所以垄断了语言便垄断了权力。圣经中对上帝的崇拜实质上暗含了语言崇拜的隐喻。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对语言进行垄断的企图无数次地发生过。但由于语言无所不在的属性,无论是哪个利益集团,对语言的垄断都是相对的,都不可能是彻底的。而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对语言的垄断则体现在对话语方式和传播渠道的垄断上。垄断了话语方式和话语传播渠道

就掌控了信息和知识,从而也就具有对“真相”和“真理”进行诠释的优势和权力。语言构建我们的现实。伯克认为,术语本质上是选择性的,即使某一术语是现实的一种反映(reflection),它同时也是对现实的一种背离(deflection)(Burke, 1966: 45)。世界反映在语言中,人们便“有所见有所不见”(同上: 46)。因此,当“真理”和“真相”的诠释被利益所左右时,实际上人们的思想,虽然不是绝对地,也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垄断或部分垄断语言的集团左右了,人们的思想被接管了,人们的行动被控制了。

古代的修辞学家早就意识到语言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够驱使人们采取行动。高尔吉亚(Gorgias)甚至说语言对人的精神具有强大的作用力,就像药品对人的躯体具有作用力那样。语言所具有的说服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使人神魂颠倒,可以“使人丢掉恐惧、摆脱悲伤、平添欢乐、滋生怜悯”(Crowley, 1994: 13)。伊索克拉底(Isocrates)认为语言是社会的基础,是所有思想和行动的指南(hegemoon)。人们之所以能够认识世界上的差异,做出事物之间的区分,理解诸如正义或现实这样的概念,也都有赖于语言。

为什么被认为纯粹是中性的,可以为任何人所用的语言会成为部分人的工具?为什么一些人的语言会像荷马史诗中海妖(Siren)的歌声那样迷人?这便是修辞的魅力。我们说语言具有力量,这力量实际上来自修辞。

汉语的“修辞”和“修辞学”在英语中对应的是 rhetoric。但是,它们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关系。无论是从起源、发展过程,还是从现状看,它们之间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在当代,两者的差异是如此之大。在我国,修辞学是一片整治得非常精致的绿色花圃,虽然不断有人拓展边界,但界线还是相当清晰的。而当代西方的修辞学已经几乎让人看不到清晰的边界,以至于已经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让各方共同接受的定义,甚至很难找到一部《修辞学概论》来帮助初学者了解西方修辞学的概貌。它不但和传播学直接扭抱在一起,而且已经渗透到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生物学、医学等科学领域里。西方的修辞学

本来在起源上就和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间曾经平行发展,而到了20世纪,两者又再一次缠绕到了一起。在我国,对修辞学的研究还基本上没有突破语言的范畴。而在西方,凡是使用符号进行交际的行为都已经被纳入了修辞学的范围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修辞学实践和理论已经成为构筑西方,特别是美国政治社会的基础。每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就是西方修辞学实践的典型舞台,宛如两千多年前希腊和罗马公共辩论的延续。所不同的是,原来的 audience(听众)已经不是现在的 audience(受众),原来仅仅在广场回响的声音在当今科学技术的支撑下已经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使几乎所有的地球人都成为公共语篇(甚至私人语篇)潜在的 audience(受众)。从西方的政治论辩到“新闻自由”,再到个人的“言论自由”,这些美丽的词语和概念已经成为西方民主政体的有力支撑。

但是,我们不能被西方修辞和西方政治冠冕堂皇的语言所迷惑。当许多人为美国的政治论辩欢呼叫好时,我们却依稀看到了西方修辞学诞生之初诡辩者(sophists)的身影;当一些人对西方的新闻自由艳羡不已时,我们经常听到的却是“金喇叭”^①的声音。一旦某些利益团体掌握了“语言标记权”(linguistic labeling right),“恐怖主义”或“恐怖分子”等类似标签便会不分青红皂白地贴在他们不喜欢的群体身上。在修辞学诞生之初,柏拉图(Plato)就对修辞被心怀不轨的人所利用表现出了担心。在《高尔吉亚篇》(Gorgias)中,他假借苏格拉底之口把修辞学看做是“取悦于人的把戏”,只会说服无知的听众,让听众空生一种信念而不是知识(1987: 17—18)。他指责修辞学“忽视正确的知识,没有能够为善而行”(Foss et al, 1985: 4)。他的担心至今仍然是很有道理的。当修辞罔顾伦理、只服务于一己之利时,其真实性便非常值得怀疑了。

① 在一个自称非常民主的岛国上,每件事都要经过全民表决。居民表达意见的方式是吹金喇叭,赞成和反对的都吹金喇叭。哪边的声音大,就照哪边的意思办。但结果总是一边的意见占上风,因为只有富人才买得起金喇叭。

1.3 修辞与伦理

在修辞学的发展中,修辞实践和修辞理论是基本上平行发展的两条支流。从起源上说,修辞实践要早于修辞理论。古希腊时期的诡辩派首先从事的是论辩、演讲,然后才开始进行修辞技巧的传授和修辞理论的总结。西方古典修辞实践主要是运用语言手段,通过刻意的谋划、组织和呈现,辅以非语言手段强化效果,达到说服听众的目的。柏拉图注意到了诡辩派在修辞活动中为达到说服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现象,因而试图区分诡辩者所践行的伪修辞(false rhetoric)和根植于哲学的理想修辞(ideal rhetoric)或真修辞(true rhetoric)。修辞技巧或修辞理论无所谓真假,有“真”“假”之分的应该是修辞活动的主体,或者说,是参与修辞活动的人的动机在起作用。修辞就像一把刀,可以用来作为抵御侵略、保护自己的工具,也可以成为强盗的杀人凶器。因此,到了20世纪,理查德·韦弗(Richard Weaver)把伦理引入了修辞理论中。由此,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修辞实践:一种是以求真为善为动机的修辞,一种是以利益为驱动的修辞。

在这两种修辞中,以求真为善为目的的修辞活动就是柏拉图所说的根植于哲学的真修辞。实际上,由于语言已经把从自然中擢拔出来,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的一条通道,同时也成为人接触真实自然的屏障。因此,绝对的“真实”只是一种追求的理想,我们只可能无限接近,却不可能得到绝对的“真实”。因为意义是主观的产物,“传达给我们的事实和事件是选择的结果,而选择是由信息源决定的”(Vatz, 1999: 228)。“对于可及的信息,人们只能够使用极小的一部分。因而,关键问题是,……参与者选择什么、忽视什么以构建意义结构。”(Edelman, 1971: 33)对相关事实和事件的选择完全是任意的;意义不是从某个情景中发现的,而是说话者创造的;只要人们描述一个事件或情景,他就会使用诱导性语言。对受众而言,只有通过语言描述,事件才有意义,而“事件主要是通过描述它们的语言创造的”(同上: 65)。

同时,求真和为善并不总是能够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有时候两者会发生矛盾。如何把握真善之间的平衡,最大限度地发挥修辞有利于人类的作用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当前的媒体工作者以及一些公众试图通过追求真相以推动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努力无疑是值得称许的。但是一味地求真而忽视了为善则有可能损害公众的利益从而受到公众的唾弃。一位记者为了追求真实性,蹲在被雨水淹没的窨井口,他不是为了提醒行人而是为了抓拍行人跌进窨井的照片。这个事件公布后之所以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应,就是因为记者没有正确地把握真和善的关系,为了求真而忽视了善。另外,医生为了减少病人的担忧和焦虑,向病人隐瞒严重病情的做法则是为了善而牺牲真。由小及大,在社会管理中,管理者也不得不权衡两者的关系,不得不在维护两者的平衡中斟酌修辞方式。从这个角度看,在求真为善中,也是有利益牵涉其中的。区别在于:是为了人类利益,还是为了一国之利益;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还是为了小团体甚至是个人的私利。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语篇媒介的伦理性问题。当人类仅仅使用声音作为语言媒介的时候,作为语篇传播的唯一介质,声音无所谓伦理性问题,不过是一种不得不使用的传播工具罢了。尽管在使用口头语的过程中,言者表达、听者理解中会出现偏差,产生误解,甚至也会有小人散播流言飞语等,但这时的媒介的伦理性完全依附于言者的道德水准,因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当文字出现的时候,语篇的传播便以一种静态的形式突破了时空的范围限制,从其存在方式的即时、即地的瞬时性到在固体介质上凝固成视觉符号具有传播的时空延展性,其影响范围被大大地扩展了。与此同时,语篇也就脱离了作者的控制,很容易被人随意增删、篡改、曲解,甚至出现伪作。这时,语篇传播媒介的伦理性已经初露端倪。据说,苏格拉底不愿著述,就是因为担心自己的思想被随意曲解而自己却无力维护。

现代技术的发展不断革新了语篇的传播渠道。在现代技术的支持下,语音超越时空早已成为现实,而今,当互联网的触角伸展到世界各个角落的时候,这种崭新的语篇媒介的伦理性问题已经不容忽视了。

互联网媒介的伦理性之所以凸显是由几个因素促成的。首先,由于互联网传播方式的开放性,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发布语篇,从而应验了“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句古训。“无德者”隐身于幕后,无须借助于人品力量增加说服效果,也脱离了人品的约束作用,从而可言人前所不能言、不可言、不敢言。其次,由于互联网媒介对于语篇而言,成本低廉或者几乎可以不计成本,而受众面对汹涌而来的信息又难以花费大量的精力进行甄别和批判,因而便不免被误导、被欺骗、被利用。再者,互联网传播具有瞬时性特征,语篇一旦发布,便很可能迅速传播开来,脱离作者的监控使作者无法修改和撤回。媒介的伦理性追根究底是人的道德性问题。而在崇尚自由、个性的当代社会中,没有伦理和道德约束的媒介很可能成为无德之人的帮凶,而深受其害的则是公众和社会。

在前文已经提到,修辞活动在语言活动之外,还有其他非语言因素的参与。特别是在劳埃德·比彻尔提出修辞情景(rhetorical situation)(Bitzer, 1968: 1)这一概念后,非语言因素已经成为修辞过程中一个不得不给予重视的因素了。而在以利益为驱动的修辞活动中,则更是如此。在多数修辞情景中,起到主要说服作用并驱使受众行动以改变情急状态(exigence)的是语篇。但是当一些传统的语篇已经不足以改变情急状态的时候,非语言手段便成为首选。2004年3月20日发生在我国台湾地区政治选举中的枪击事件便是非语言因素主导的以利益为驱动的修辞行为的代表,尽管枪击的真正动机还没有查清,但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在研究修辞的劝说效果中,修辞情景中的非语言限制项(constraints)是不应忽视的,特别是在政治修辞批评中尤其如此。

1.4 修辞手段与暴力手段

在解决任何矛盾和冲突时,语言基本上都是作为首选手段来使用的。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说服的效果取决于言者(包括说话人和作